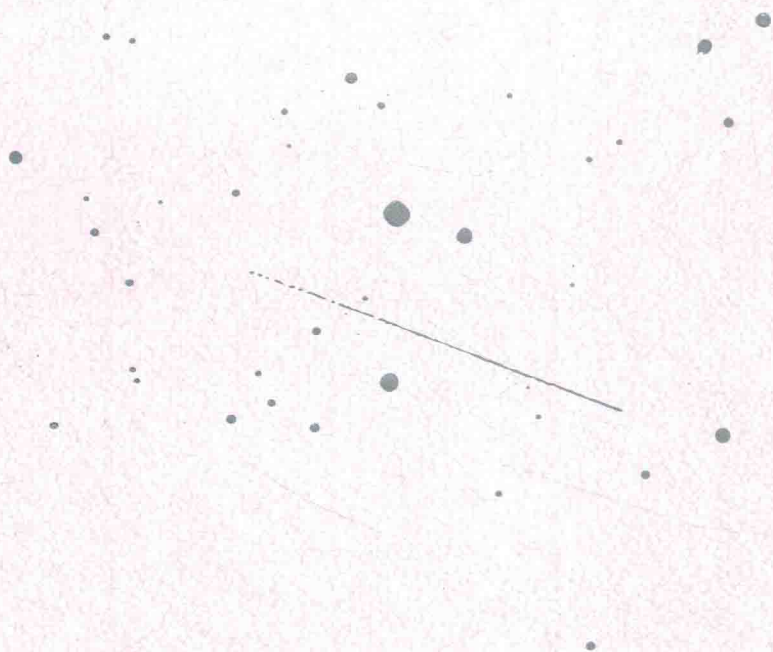


星光

陈思和
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星光

陈思和
——
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光/陈思和著. —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
2018.7

ISBN 978-7-5473-1275-9

I. ①星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5306 号

星光

出版发行: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(021)62417400

邮政编码:200336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90mm×1240mm 1/32

字 数:192 千字

印 张:9.5

版 次: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275-9

定 价:49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辑

巴金 / 3

我心中的巴金先生 / 10

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/ 22

殊途同致终有别

——记贾芝先生与贾植芳先生 / 51

感天动地夫妻情

——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 / 67

五年来的思念 / 76

第二辑

毕修勺先生 / 89

吴朗西先生 / 95

郑超麟先生 / 101

陈映真先生 / 105

梁披云和他的理想主义 / 110

康乃馨不再飘香

——怀念王瑶教授 / 117

第三辑

我的老师们 / 129

朱东润先生 / 142

章培恒先生 / 147

曾华鹏先生 / 157

范伯群先生 / 164

潘旭澜先生 / 170

第四辑

陈子展先生 / 179

许杰先生 / 184

施蛰存先生 / 188

柯灵先生 / 192

李子云老师 / 198

周介人老师 / 206

第五辑

胡河清 / 215

赵长天 / 217

程乃珊 / 221

褚钰泉 / 226

王富仁 / 232

沈善增 / 238

第六辑

无名氏先生 / 247

沈谦先生 / 253

想念秀丽 / 257

耀德不见了,文学衰落了 / 264

香港文坛“左翼”领军人物

——曾敏之先生 / 274

假如中国现代小说也有“大传统”

——纪念夏志清先生 / 280

跋 / 289

——
第一辑
——

巴金

上海西区，幽静的武康路旁有一幢美丽的花园洋房。冬天，树叶落尽，只留下瘦削的枝丫向着蓝天尖利地伸展开去，天因为清冷而空旷，枝丫也因为去掉了多余的黄叶显得舒展。一位老人，他的脚步正稳稳地走过丰硕的秋天，接近那清冷的冬天，然而生命之树即使在枯枝残叶中却依然挺拔如剑，昂然向上。四十多年来，他一直在这座美丽的花园里散步，不知不觉的，已经迈过了九十五岁的门槛。现在，他已经很难得下地走路了，他长年住在华东医院和杭州西子湖畔，身体好的时候也会坐在轮椅上慢慢地被人推着向前走去，但他的思想却一刻也停不下来，有时会走得很远很远……

这幢房子里曾经有过辉煌而温馨的日子。1955年国庆前他全家从淮海坊搬入这里，他在客厅里接待的第一批远客就是法国著名作家让-保罗·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·波伏瓦。那时他正忙啊，忙开会，忙出国，忙招待，忙着应付约稿……过去那种足不出户、闭门写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他心里充满了欢悦和激情，就在那段时间里，他写下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作《上海，美丽的土

地,我们的》。这个诗一样的题目最初不是他想出来的,而是他的朋友、以文笔优美著称的散文家丽尼写过的一个题目。那是在1938年,上海沦陷在日本军队铁骑下的时候。1959年他拾起了这句话,把它写进一篇散文里。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:“在我过去的作品里,我写到上海的时候不曾用过一次美丽的形容词,细心的读者在我的文章里看见的倒是强烈的憎恨。”是啊,要论述作家巴金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关系,还必须从头说起,从他对这个城市的憎恨说起。

1923年5月,他还是一个不到十九岁的外国语专门学校的中学生,跟着他的哥哥离开了成都老家,满怀着憧憬,搭一只竹筏木船,经宜宾、上重庆,驶向茫茫人海。那时他还没有取“巴金”这个名字,他本名叫李尧棠。一个月以后弟兄俩踏上了上海的土地,他们本来想雇一辆马车去找亲戚,可是没走几步路马车就违反了交通规则,被巡捕带进巡捕房罚款。这是上海给这个年轻人的第一个下马威,事过三十几年后,他在文章里还恨恨地说:他到上海最先认识的不是旅馆,而是巡捕房。那一天他们从巡捕房里出来,投亲不成,就近在四马路的一家旅馆里住下。那里是著名的红灯区,对面就是“神仙世界”游乐场,到了晚上处处是灯红酒绿。弟兄俩好奇地扒在临街的窗口往下看,见到了连续不断的人力车在街上跑,车上装了小电灯,坐了漂亮的姑娘,他们知道那是妓女,上海的妓女要比成都的土娼气派得多。

那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安那其主义者,他有自己的政治信仰,并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积极投入社会革命运动。他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完高中,1925年8月回到上海,住在法租界贝勒路

(现黄陂南路)天祥里,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,从事他的宣传、写作、读书的理想生活。他的朋友毛一波在一篇散文里回忆了这段时期的生活:“我们那时穷得只能吃几个面包和喝一点清水,然而,同志们的精神却是十分饱满。我们还分了余钱出来出版革命刊物呢。那一个生了肺病的同志芾甘,正在负责译述先烈的遗著。从他难看的面色和干咳声中,他常是冒雨去为主义而工作。我也曾和他一道在马路上奔跑过。让那斜风和冷雨打在自己头上。从贝勒路的南头跑到远远的印刷所去送书报,雨水常是迷茫了我们的近视眼镜……”那“芾甘同志”就是巴金。他们的生活是贫穷的,但精神上充满了乐观、昂扬的战斗性。巴金参与创办了《民众》杂志,翻译了特写集《断头台上》。更重要的是这段生活经验为巴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,他在30年代创作了小说《爱情的三部曲》,其中《雾》和《雨》,多少反映了这一时期他和同志们的生活片段。

一年以后,他和他的同志又先后在康悌路(建国东路)和马浪路(马当路)居住,继续从事安那其主义的活动。那时战争已经打响,北伐军步步逼近上海,工人武装起义正在酝酿,这个被军阀孙传芳统治的东方大都市到处是骚乱和血腥,马路上常常有被杀的人头挂在那儿……巴金再也待不下去了,他怀着满腔的憎恨,离开了上海,赴法国留学。但这个城市留给他的强烈的刺激,在他的记忆中没有淡薄,不久,他在异国的寂寞中写下了第一部小说《灭亡》,真实地写出了他住在康悌路的一段生活场景:混乱、恐怖、杀头、革命、献身……这部小说写完后,他寄给国内的朋友,希望能自费出版,没想到让当时主持《小说月报》的主编叶圣陶看到

了,把它在文坛上最有影响的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。小说轰动了文坛,1929年初巴金回到上海,他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年轻作家了。那一年,他才二十五岁。

1930年代起,巴金定居在上海,他先是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,后因“一·二八”战争这一片土地变成废墟,他又住过好几处地方,都是临时性的。因为那几年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国内旅行和出国居住,直到1937年搬到霞飞路(淮海中路)霞飞坊,才算有了比较稳定的住所。1930年以后他成为一个多产作家而蜚声文坛,《家》、《雾》、《雨》、《电》、《新生》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都完成在这个时期。他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,声望越来越高,可是他的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寂寞和迷茫。他所从事的社会运动已经不复存在,他原来天真地希望理想像明天的太阳一样升起,现在也变得不可能了,他内心深处充满绝望,只能靠写小说来倾吐。所以,他的压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,而是来自人格的分裂: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,无意中的写作生涯却一步步诱得他功名成就,他的痛苦、矛盾、焦虑……这种种情绪用文学宣泄出来以后,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灵,他成了青年人的偶像。

那一年巴金认识了萧珊。萧珊本名叫陈蕴珍,那时是上海爱国女中的活跃分子,她作为读者给作家写信,提出许多人生问题。巴金有一本小册子《短简》,收入了他回答读者的各种信件,其中有一封就是给萧珊的。萧珊的好朋友陶肃琼是校学生会主席,她们邀请著名作家巴金和靳以来学校演讲。向来不善言辞的巴金居然接受了女孩的邀请,还拖了能说会道的戏剧家李健吾一起去

捧场。据说那天演讲并不成功，巴金上台第一句就说“我是四川人”这样一句毫不相干的话。但作家与女学生的浪漫恋曲就这样开始了。后来萧珊与巴金相爱，陶肃琼与靳以相爱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巴金与萧珊的恋曲奏响了整整八年，他们与民族共同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，正因为战争，才使他们的爱变得持久而深沉。八年中，他们几度离散，几度相聚，天南地北，两情依依。巴金奔波于广州、上海、昆明、重庆等地，办杂志、出丛书、写小说，为宣传抗战和保存中国现代文学的精血，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大责任。而萧珊则在西南联大外语系读书，假期里陪着巴金一起在炮火下工作。那时候萧珊正在享受生命的最美成果，她当时的同学这样描绘她：“你穿着矮领子的花布旗袍，梳两根短辫，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，清澈纯真，还有你那常被我们赞美的酒窝嵌在散发青春光彩的脸庞上……那是你的黄金时代，学业、友谊、爱情都在丰收。”1944年，他们终于在贵阳花溪静静地住了两三天，他们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个小菜，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碰杯、聊天，然后在小溪的潺潺流水声中散步回到旅馆，他们宣布结婚了。他们最初的家庭建立在重庆，这是巴金一生中最后一个文学创作的高潮期，他思如泉涌，写作了《憩园》、《第四病室》和《寒夜》。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霞飞坊，那里是名人荟萃之地，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等都住在那里，生活相当安宁。但是，巴金的一颗悲天悯人之心，依然充满了黑暗和痛苦。在《寒夜》里，他悲愤地描写善良的小公务员如何在失业中贫病交加地死去，妻子随人出走，人去楼空……他忍不住在结尾时写道：“夜，的确太

冷了。”

巴金与萧珊共同度过了三十几年，萧珊年轻，性格又开朗活泼，她为巴金操持了一个人员众多的大家庭：两个孩子、丈夫的继母、丈夫的妹妹……在空余的时间里她还翻译了俄国普希金、屠格涅夫的小说。我见过几张摄于1960年代的照片：一张是巴金在宽大的书房里与儿子下棋，女儿与妻子静静地在一旁观看，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微笑。另外一张是武康路花园的绿茵草地上，背景有月季花、栀子花和牡丹，女主人兴奋地逗着一条小狗在玩耍，笑得那样甜。这是难得的温馨的日子，为了珍惜和保护这般幸福，他写作了近百万字的时代赞歌，呼出了“上海，美丽的土地，我们的”。但是，谁又能料到“文革”的灾难却一步步靠近，几年以后，仿佛是一声晴天霹雳，巴金被押上批斗台，女主持人在惊忧中绝望地死去……

巴金惊醒过来，他又清醒地拿起了笔，开始解剖自我，总结这一场历史性大灾难的经验教训。一篇一篇的随想喷薄而出，他大声疾呼，要“讲真话”，要“把心掏出来”，要建立“文革博物馆”……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，他就用颤抖的手一字一字地写着他的随想，倾诉着他的严肃思考和精神探索。终于，一部凝聚了老人晚年心血的“讲真话的大书”——《随想录》完成了，煌煌五卷，丰碑似的耸立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。《随想录》出版以来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，十多年来已有近十种版本流传于世，最近，它的手稿本也即将出世，人们将从老人一笔一画的颤抖字迹中，再一次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力。

究竟做怎样一个人？在拜金主义弥漫人际道德空间的时代

里,也许没什么人会在乎这个问题,但是巴金在乎。古人云:年十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用这条人生规律来对照巴金一生:他十五岁正值“五四”运动,那一年他读了《告少年》、《夜未央》等进步书籍,完成了“立誓献身的一瞬间”,开始投入为求人类解放的社会运动,可以说“志于学”的时代。三十岁那年,他已经写出了《灭亡》、《家》、《爱情的三部曲》等作品,成为新文学的重要作家,可谓已经“立”。四十岁那年在贵阳与萧珊结婚,成家立业,阅世多矣,也算是“不惑”。可是到了五十岁就不一样了,历史给他开了玩笑:1954年,文艺界乌云正在慢慢聚拢,“天命”未卜。六十岁更是在惊恐不安中度过,斥骂之声,不绝于耳,耳安得“顺”?直到七十岁以后,终于噩梦醒来,重知天命,才逐步进入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的境界了吧。

1998年8月12日写于黑水斋

我心中的巴金先生

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。有许多事情发生，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，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脑子里。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比如，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巴金先生的？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秋天，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《文学评论》（大约是五月份），还得到过巴金先生的首肯，于是我记忆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，我与李辉上门拜访的。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，记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，似乎是天气转凉的时候。我一直这么记忆，还写进了一些文章里。但是最近问及李辉，他查了当年日记，竟是1982年1月7日。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，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，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，想在临行前见一次巴金。于是，由李小棠兄安排（我们都是同班同学），我们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。

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？我没有记录，李辉是有的，他如果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，一定会有重要的细节披露。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，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，巴金先生那天身体不好，似乎是感冒了，还有些发烧。我们谈话中，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